

**[Translation Studies]**

AI-Empowered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Teahouse*: A Digital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Varieties

HUO Jia ZHANG Bing

Sino-Germ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ly 11, 2026

Accepted: August 1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HUO Jia & ZHANG Bing. (2026). AI-Empowered and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Teahouse*: A Digital Analysi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Varieti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28–13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3>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ranslation studies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shift from traditional textual comparison toward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paradigms. Taking the German translations of Lao She's classic play *Teahouse* as its object of study, this article integrates sociolinguistic theory with AI-enabled computational methods to examin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language varieti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digital analysis. It first identifies the sociolinguistic features of Beijing dialect, forms of address, idioms, and other language varieties in *Teahouse*; it then introduces large language models, word embeddings, and related AI techniques to construct a corpus of language varieties and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Finally, through case-based comparison, the article examine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Uwe Kräuter-Huo Yong translation and the Volker Klöpsch translation in their treatment of dialect, culture-loaded expressions,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I-enabled digital analysis can effectively reveal latent patter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language varieties, provide new methodological support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open new pathways for the practice and criticism of drama transl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ciolinguistics; *Teahouse*; German Translations; Language Varietie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gital Analysi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HUO Jia (1989–), femal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the Sino-Germ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ANG Bing (1980–), female, is currently a lecturer at the Sino-German Colleg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 賦能與社會語言學視角下的《茶館》德譯本研究

——跨文化交際與語言變體的數字化解析

霍佳 張冰

上海理工大學中德國際學院

摘要：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翻譯研究正經歷從傳統的文本對照向數字化、智能化範式的深刻轉型。本文以老舍經典話劇《茶館》的德譯本為研究對象，綜合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與 AI 賦能的計算方法，探討跨文化交際中語言變體的翻譯策略及其數字化解析路徑。研究首先梳理《茶館》中北京方言、社會稱呼語、習語等語言變體的社會語言學特徵；繼而引入大語言模型、詞嵌入等 AI 技術，構建語言變體語料庫並進行多維分析；最後通過實例對比兩個德譯本：Uwe Kräuter（烏葦·克勞特）譯本與 Volker Klöpsch（福爾克爾·克略樸士）譯本在方言處理、文化負載詞轉譯及會話含義再現等方面的策略異同。研究表明，AI 賦能的數字化解析能夠有效揭示語言變體翻譯中的隱含模式，為跨文化交際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論支撐，同時也為戲劇翻譯的實踐與批評開闢了新的路徑。

關鍵詞：人工智能；社會語言學；《茶館》；德譯本；語言變體；跨文化交際；數字化解析

一、引言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雙重驅動的當代語境下，跨文化交際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面對面對話或文本翻譯，而是日益呈現出多層次、多模態的複雜特徵。老舍先生創作於 1957 年的三幕話劇《茶館》，以北京裕泰茶館為空間載體，通過近五十個人物的命運沈浮，濃縮了中國自戊戌變法至抗日戰爭勝利近半個世紀的社會變遷。這部作品在語言藝術上的最大特色，在於其大量運用北京方言、社會稱呼語、習語及時代性口語，構成了豐富而立體的語言變體系統。翻譯是不同文化間的交流，不僅要考慮語言方面，更多地還要考慮文化方面。《茶館》中的語言變體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內涵，成為翻譯研究的重要對象。

老舍是「除魯迅外，20 世紀德語區聲名最為顯赫且被翻譯最多的中國作家」，他的多部作品在 80 年代陸續走進德語讀者視野。《茶館》共有兩個德語譯本：其一由德國漢學家 Volker Klöpsch（福爾克爾·克略樸士）主編、華裔學者劉仁凱等人翻譯。其二由致力於中德文化交流的 Uwe Kräuter（烏葦·克勞特）與外文出版社霍勇共同翻譯。

然而，現有對《茶館》德譯本的研究多停留在歸化與異化策略的二元討論，或集中於會話含義等語用學層面的個案分析。如從歸化和異化策略出發，探討《茶館》德譯本中人名、習語等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但尚未有研究從社會語言學的系統視角出發，借助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大規模、多維度的數字化解析。近年來，大語言模型（LLM）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發展為語言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論可能。有研究表明，AI 基礎模型可以輔助識別方言差異，數據驅動語言學將語言視為人驅概率系統，致力於發現人類語言系統的運作規律並考察這些規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適用性。將 AI 技術應用於《茶館》德譯本的數字化解析，有助於揭示語言變體翻譯中的隱含模式，為跨文化交際理論提供新的實證支撐。

本文旨在回答三個核心問題：《茶館》中北京方言、社會稱呼語、習語等語言變體在德譯本中經歷了怎樣



的轉化？AI 技術如何幫助揭示語言變體翻譯中的模式與規律？數字化解析如何為跨文化交際理論提供新的實證支撐？

二、社會語言學視角下的語言變體與翻譯

（一）語言變體理論及其翻譯維度

社會語言學將語言變體(language variety)定義為同一種語言在社會、地理、功能等維度上產生的不同形式。語碼混合現象在全球超過一半的雙語或多語人口中普遍存在,尤其在社交媒體等非正式平台中尤為常見,從社會語言學視角看,語碼混合現象背後涉及社會、經濟、民族關係、生活方式變遷等外部因素,以及語言選擇性、交際需求等內部因素。《茶館》之所以成為翻譯研究的經典案例,正是因為其文本同時疊加了地理方言(北京話)、社會方言(不同階層人物的用語特徵)、語域變體(茶館這一特定場景的交際規範)以及時代方言(跨越晚清、民國、抗戰三個歷史時期)等多重變體維度。

從翻譯角度而言,語言變體的傳譯面臨著一個根本性困境:源語中的方言在目標語中往往找不到完全對等的『方言等價物』,因為每一種方言都根植於特定的地理—社會—文化土壤。因此,譯者必須在忠實表達文化內涵與保持舞台表演的可理解性之間尋找平衡。

（二）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映射』問題

跨文化交際理論強調,不同文化間的語言轉換不只是代碼轉換,更涉及認知框架與文化圖式的匹配。大語言模型的研究為理解這一現象提供了新的視角。在不同語言中,相同事物的意義在特定語義域內相似,但在不同語義域之間有所不同,如具體實物的翻譯難度大於抽象概念的翻譯。因此,譯者在處理《茶館》中的文化負載詞時,需要根據詞彙的抽象與具體程度採取差異化的翻譯策略,比如人名的翻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老舍筆下的人物姓名往往具有象徵含義——如『王利發』暗示『利路發達』,『常四爺』表明排行與身份。

（三）會話含義與功能翻譯理論的結合

會話含義理論(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由格賴斯(H. P. Grice)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強調在所有的語言交際中,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都有一種默契的合作,使整個交談過程所說的話符合交流的目標和方向。但是,在日常交際過程中一方為了某種特定的目的而故意違背合作原則,向對方暗示言外之意是常有的事。

功能翻譯理論,尤其是 Christina Nord(克里斯蒂安·諾德)的理論則主張,翻譯策略的制定應以交際目的為導向,譯者需要在源語作者、譯語受眾與翻譯發起者之間協調『忠誠』。作為雙語交際和跨文化交際的一種重要形式,翻譯不同於單語語境下和單一文化領域的交際,源語信息發送者和譯文信息接受者之間的時空錯位和文化差異可能成為影響其成功交流的一大障礙。將會話含義理論與功能翻譯理論結合,意味著譯者在處理《茶館》中的『言外之意』時,不能機械地追求字面對等,而應從交際效果出發,靈活選擇合適的翻譯方式,如『直譯+注釋』,『意譯』,『改寫』等策略。這種理論視角為理解 Uwe Kräuter(烏韋·克勞特)譯本的策略選擇。

（四）AI 賦能:從語料庫到計算模型的技術路徑

近年來,以自然語言處理為核心的 AI 技術為語言變體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工具。詞嵌入(Word

Embedding) 技術通過將詞彙映射到密集、連續的向量空間,使得語義相似的詞語在空間中距離相近。這一技術使得研究者能夠定量比較不同語言中詞彙的語義相似性與差異性,從而揭示跨語言映射中的偏移與空缺。南加州大學研究團隊開發的 Voxlect 平台是一個典型的 AI 賦能案例。該平台收集了超過 200 萬條來自 30 個公開數據集的語音樣本,涵蓋 11 種主要語言系統(包括中文普通話和粵語),每種語言都包含了多個地區變體,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多語言方言識別數據庫。這項研究就像是為 AI 打造了一副『語言學家的耳朵』,能夠準確分辨出同一種語言在不同地區的細微差別。

在翻譯技術層面,神經機器翻譯(NMT)系統通過深度學習算法,已實現 95 種語言間的即時互譯,其翻譯準確率相較傳統統計模型提升 42%。『語境感知引擎』的引入解決了傳統翻譯的『文化失語』困境,系統通過分析用戶的地理定位、社交關係網絡和歷史交互數據,自動匹配最合適的語體風格。

對於《茶館》德譯本研究而言,AI 賦能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可以大規模、系統化地比較中德文本中語言變體的對應關係;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聚類分析和語義空間測量,揭示譯者在處理不同類別語言變體時的策略偏好及其深層動因。

三、語料與分析方法:數字化語料庫的構建

(一) 語料來源與數字化處理

本研究選取的語料包括:老舍《茶館》中文原版(1957 年首版)及其兩個德譯本——Uwe Kräuter(烏韋·克勞特)譯本,劇目名『Das Teehaus』)與 Volker Klöpsch(福爾克爾·克略樸士)等譯本。Uwe Kräuter 的譯本是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德譯本,曾多次在德國劇院上演,其翻譯策略在上文已有提及;另一譯本則用於對比分析,以揭示不同譯者面對同一語言變體問題時的策略差異。語料數字化處理的基本流程包括:將紙質文本掃描並 OCR 識別,進行人工校對以確保文本質量;對中德文本進行平行對齊(paragraph-level 及 sentence-level)。對中文文本中的語言變體進行分類標注(方言詞、稱呼語、習語、文化負載詞、時代方言等);對德譯文本中的對應翻譯進行功能標注(直譯/意譯/改寫/省略等)。

(二) 語言變體的分類標注體系

本文採用多層標注體系,對《茶館》中文文本中的語言變體進行分類。第一層為『變體類型』,包括:地理方言(如『壓根兒』『敢情』『抖機靈』等北京方言特徵詞)、社會方言(如不同階層人物的稱呼語與語氣標記)、時代方言(如晚清時期的稱謂『爺』『大人』與民國時期的『先生』『同志』)、語域變體(如茶館夥計的市井口語與知識分子的文雅措辭)。第二層為『文化負載程度』,分為高、中、低三檔,以反映詞彙在跨文化轉換中的難度維度。第三層為『會話含義類別』,標注該語言片段是否包含合作原則的違反以及具體的含義類型。這一分類體系參考了社會語言學中關於語碼混合的分類方法,即從社會、經濟、民族關係等外部因素以及語言選擇性、交際需求等內部因素兩個維度進行分析。

(三) AI 分析工具的選擇與適配

本研究採用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Word2Vec(用於訓練詞向量並測量語義距離)、AntConc(用於語料庫關鍵詞檢索與搭配分析)、PCA(主成分分析,用於降維可視化)以及聚類分析算法(用於識別翻譯策略的模式類別)。詞嵌入模型的訓練參考了埃文斯等人的方法,即在大規模多語言文本數據中構建詞嵌入模型,比較不同語言中詞語的語義相似性和差異性。此外,本文還嘗試引入大語言模型的嵌入層對平行語料的語義



相似度進行計算,從而定量評估不同譯本的『信息保真度』與『文化適配度』。

四、《茶館》德譯本中的語言變體翻譯

(一) 北京方言的德語轉化:不可譯性的應對

北京方言是《茶館》語言風格的核心要素之一。中文原文中大量使用『壓根兒』(意為『從來』)『敢情』(意為『原來、當然』)『咱家』『滿世界』等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表達,這些詞彙在標準德語中缺乏直接對應。克勞特譯本的處理策略以『功能對等』為主:面對『壓根兒』這類方言副詞,他在多數情況下選擇標準德語的對應表達(如使用『überhaupt』,『von jeher』),通過上下文再現其語用功能,而犧牲其地域色彩。克勞特的策略本質上是以歸化為主的靈活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對地理方言『不可譯性』的認識在學界已形成共識。克勞特的策略選擇驗證了這一理論:他並未嘗試使用德語區域方言去對應北京方言,而是通過在語域維度的創造性轉化,在『不可譯』的困境中開闢了『可理解』的路徑。

(二) 『數來寶』與韻律模仿:跨文化表演文本的翻譯

《茶館》每一幕開頭均由大傻楊以『數來寶』形式進行敘說,這是中國傳統曲藝的韻律形式。以下為第一幕開篇的中德對照:

中文:大傻楊,打竹板兒,一來來到大茶館兒。大茶館,老裕泰,生意興隆真不賴。

德譯: Ich bin der „Dummkopf“ Yang und geh‘ von Haus zu Haus.

Vielleicht bekomm‘ ich hier nun doch ‘mal einen Schmaus.

Dies große Teehaus, Yutai genannt,

Welch‘ blühend‘ Geschäft, bei allen bekannt.

在這一組對照中,克勞特展現了極高的翻譯技巧。他不僅成功再現了原文的語義信息,還再造了德文詩歌的韻律結構(aabb 韻式與四步揚抑格),使得朗誦者能夠以吟唱方式表演。這種翻譯策略超越了簡單的『語義對等』,進入了『表演性對等』的層面——這正是戲劇翻譯區別於文學翻譯的核心要求。這段翻譯非常受觀眾歡迎,觀眾對大傻楊的開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而從社會語言學角度看,『數來寶』本身是一種承載著中國民間文化傳統的語域變體,其翻譯不僅要處理語言層面的轉換,還要重建原文的『韻律場』與『表演場』。這一案例啟示我們,AI 賦能的數字化分析若能納入韻律與節奏參數,將能更全面地評估翻譯中的表演性維度。

(三) 稱呼語與身份建構:社會方言的翻譯策略

《茶館》中的稱呼語系統極為複雜,貫穿於人物之間的權力關係和情感距離之中。例如,『王掌櫃』『馬五爺』『龐太監』『小劉麻子』等稱呼,既標示社會身份,也暗含情感態度。這些稱呼在中文里具有高度的語境依賴性:同一個人物在不同場景中被稱呼為『您』『你』『哥哥』『兄弟』,傳達的是迥異的交際含義。克勞特的德譯本在稱呼語處理上表現出較高的策略靈活性:面對帶有官階或職銜的稱呼(如『龐太監』『馬五爺』),譯者主要採用直譯加音譯的模式;面對熟人間的親暱稱呼(如『哥兒們』),則採用德語中對應的親切表達。目的論視角下的問候語德譯比較研究也表明,不同的翻譯目的會對翻譯策略的選擇產生直接影響。這種『有選

擇性的異化與歸化』,本質上是譯者對不同社會方言角色功能的理解與再現。

從數字化分析的視角,我們可以通過詞嵌入模型測量中德稱呼語的語義空間距離。初步分析表明:在源語空間中,『王利發—掌櫃—您』構成一組關聯緊密的語義簇,蘊含的是『尊重+服務關係』的複合含義;而在目標語空間中,『Wang Lifa—Wirt—Sie』構成的語義簇雖保留了尊重維度,但服務關係的隱含義有所弱化。這種語義偏移的存在,說明跨語言轉換中社會方言的功能往往會經歷『文化平滑』或『社會語義降噪』的過程。這與埃文斯等人的研究結論一致——文化距離、物理空間距離等因素都影響著詞彙之間的意義構建差異。

(四) 文化負載詞的數字化解析:以『茶葉與茶文化』為例

《茶館》的文化負載詞分布廣泛,涵蓋飲食(如『爛肉面』『爛糊面』)、稱謂(如『老佛爺』『洋人』)、制度(如『旗人』『頂子』)等多個語義域。跨文化交際理論認為,語言不同維度的意義受到文化距離的深刻影響,這說明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不僅僅是語言轉換,更是認知框架的遷移。

『茶』在中文文化中不只是飲品,更是一種社會交往的媒介與隱喻。在《茶館》中,『喝茶』的場景貫穿始終,『倒茶』『沏茶』『茶錢』『茶座』等表達構成了一個特定的語義場。克勞特在譯文中通常將『茶』直譯為『Tee』,將『茶館』直譯為『Teehaus』——這一選擇看似簡單,實際上涉及複雜的文化映射:德語的『Tee』與中文的『茶』雖指稱同一物品,但其社會文化聯想卻大相逕庭。埃文斯等人的研究指出,越是具體的事物在不同語言中的意義越一致;『茶』作為具體事物,其指稱意義在不同語言中較為穩定,但其聯想的語義域卻存在明顯差異。

借助詞嵌入模型,我們可定量測量『茶』在中文與德語向量空間中的鄰居詞差異:在中文空間中,『茶』的最近鄰居包括『酒』『煙』『點心』『座兒』,暗示其與社交場合的緊密關聯;在德語空間中,『Tee』的最近鄰居則包括『Kaffee』『warm』『trinken』『gemütlich』,暗示其與『愜意的居家時刻』更為相關。這一差異定量揭示了文化映射中的偏移,也為譯者的增補說明提供了必要性論證。

(五) 會話含義與『言外之意』的翻譯策略

《茶館》中大量人物對話暗含『言外之意』,這構成了翻譯的另一重挑戰。會話含義是日常會話中最基本的語用現象之一,自格賴斯提出會話含義理論以來,該理論在語用學研究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文學作品中會話含義翻譯的主要目的是譯者如何最大程度地使譯語受眾理解源語信息中的隱含意義,譯者需要在功能翻譯理論指導下,從交際目的出發,顧及功能、文化、語境等多個維度,準確平衡好譯語受眾和原文作者間的忠誠尺度。

以第三幕中小劉麻子告訴王利發沈處長要霸佔茶館的消息時的經典台詞為例:『我一說,處長說好!他呀老把『好』說成『蒿』,特別有個洋味兒!』為了保留原文通過相似讀音造成的幽默效果,也為了體現原文中的『洋味兒』,譯者把『好』譯成德語的『gut』而把『蒿』譯成外來詞『good』,並在同傳時『注意念得有風趣』。這一處理既保留了會話含義中的幽默意圖,又通過外來詞的引入傳達了原文的『洋味兒』,是功能加忠誠理論的成功實踐。

通過對語料庫的量化分析可以發現:克勞特譯文中保留『會話含義』意圖的策略以『意譯+修辭調整』為主,偶爾使用『注釋補充』模式。而在另一譯本中,譯者更傾向於將隱含含義直接顯化,以降低德語觀眾的認知負擔。這種差異可以描述為一條『隱含保留—隱含顯化』的策略光譜。而數字化解析的價值在於:通過對全本語料的大規模標注與統計,可以量化這種策略偏好,從而為翻譯批評提供實證維度的依據。



五、AI 賦能的跨文化交際研究展望

（一）數字化解析的優勢與局限

AI 賦能的數字化方法能夠有效彌補傳統翻譯研究中定性分析的主觀性與樣本局限性。通過對《茶館》中德平行語料庫的系統標注與計算,研究者能夠發現人工閱讀難以察覺的模式——例如不同文化負載詞類型的翻譯策略分布差異、不同譯本在方言處理上的系統性偏好等。然而,數字化解析也有其固有局限。當前的 NMT 系統雖然準確率相比傳統統計模型提升了 42%,但在處理『言外之意』『文化隱喻』等高語境現象時仍存在顯著短板。大語言模型的研究也表明,聯想和隱喻的不同用法可能會引發人們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進而影響複雜思想的準確表達。機器翻譯在處理《茶館》中的諧音雙關(如『好』與『蒿』)時幾乎必然失敗,因為這類幽默依賴於特定語言的音系特徵與歷史文化背景。這意味著,AI 賦能的翻譯研究不能取代人類譯者的直覺與創造力,而應作為一種『增強分析』工具,為人類決策提供數據支持。

（二）從『描述』到『解釋』:跨學科整合的可能

將 AI 分析與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有助於實現翻譯研究從『描述性』向『解釋性』的躍升。詞嵌入技術可以提供『是甚麼』的數據答案(如『甚麼類型的語言變體在翻譯中偏移最大』),而社會語言學理論則能夠解釋『為甚麼』(如『因為這種語言變體承載著不可通約的社會文化內涵』)。在多語言社交適配領域,『語境感知引擎』通過分析用戶的地理定位、社交關係網絡和歷史交互數據,自動匹配最合適的語體風格,這種技術路徑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參照。新的技術成果可以與翻譯研究深度融合,構建更完整的跨文化交際模型。

（三）對中文文學『走出去』的啓示

《茶館》德譯本的成功案例表明,跨文化翻譯不只是一種語言轉換,更是一種文化再創造。《茶館》在德國和瑞士的成功演出,不僅體現了現實主義戲劇的持久魅力,更證明瞭『通過展現一個北京茶館中的社會百態,生動刻畫了人物形象,揭示了社會現實,讓觀眾深刻感受到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和文化底蘊』的跨文化傳播路徑是可行的。德國曼海姆民族劇院院長阿諾爾德·佩特森表示:『《茶館》的演出具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難以忘懷的,首先還是劇本本身』。

AI 賦能的數字化解析為我們提供了優化翻譯策略的工具:通過計算目標語讀者的認知負荷與文化適配度,研究者可以更理性地選擇『歸化—異化』的平衡點。對於正在『走出去』的中文文學而言,這種數據驅動的策略選擇具有重要的實踐參考價值。

六、結語

本文以《茶館》德譯本為研究對象,結合社會語言學理論與 AI 計算方法,探討跨文化交際中語言變體翻譯的數字化解析路徑。研究發現:北京方言、社會稱呼語、文化負載詞等語言變體在德譯中面臨『不可譯性』困境。而譯者通過語域移植、韻律再造等創造性轉化是關鍵。克勞特對大傻楊數來寶的翻譯成功再現意義並增強節奏韻律,是戲劇翻譯典範。當今時代,翻譯需整合不同學科,如社會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與翻譯學,這樣才能為翻譯研究提供『AI 賦能』新範式,同時為戲劇翻譯及中文文學『走出去』中的語言適配提供實踐

啓示。

但同時,如何將 AI 技術嵌入、語料庫進行標注等,有效揭示了翻譯中的隱性模式。此外,數字化解析與社會語言學理論的雙向互動構成新方法論,為跨文化譯介提供科學評估。但本研究存在語料有限等不足,隨著技術的發展,未來可擴展至多模態語料並引入深度學習模型。

參考文獻

- ① Kräuter, Uwe, and Huo Yong. *Das Teehaus*. Suhrkamp Verlag, 1980.
- ② Klöpsch, Volker. *Das Teehaus*. Rowohlt Verlag, 1980.
- ③ 姜靜:《再讀〈茶館〉:從語篇翻譯理論看地理方言的翻譯》,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04 年。
- ④ 段文婷、孫雪娥:《話劇翻譯中文化信息的傳譯——以〈茶館〉的譯本為例》,《宜春學院學報》,2016 年第 4 期,頁 74-77。
- ⑤ 趙建國、李娜:《語言變體語料庫構建及計算模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 年版。
- ⑥ 劉雨微:《大語言模型揭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中國社會科學報》,2024 年 3 月 4 日。
- ⑦ 陳曉明:《跨文化社會語言學視域下翻譯策略的建模研究》,《現代語言學》,2022 年第 2 期,頁 123-130。
- ⑧ 劉洋:《從民族的文化到人類的史詩——話劇〈茶館〉的德國之旅》,2025 年 3 月 15 日。
- ⑨ 周敏、李華:《跨文化交際理論視域下方言轉譯文化解碼路徑研究》,Open Access Library, vol. 12, no. 1, 2025, pp. 45-60.
- ⑩ 徐成平:《淺談文化翻譯中歸化和異化策略的選擇——以老舍〈茶館〉的德譯本為例》,《翻譯研究》,2015 年第 2 期,頁 55-58。
- ⑪ 龔樂寧:《文學作品中會話含義的翻譯——話劇〈茶館〉德譯個案研究》,碩士學位論文,北京: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09 年。
- ⑫ 孫國亮、高鵠:《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德語國家的譯介與接受》,中國外國文學學會,2020 年 7 月 28 日。

(Editors: JIANG Qing & Derrick MI)